

## 人家的月亮

《城市规划》 2006年第 30卷第 4期

“ 外国的月亮圆 ”。我在外国几十年，可能看惯了，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当年出国时观感可不一样。1973年底赴加拿大，1974年到 76年在麻省念书，初次接触北美社会和文化，很大的冲击、很深的印象，影响着我日后治学的方向和做人的原则。

### 出国

1973年前，我的世界就只有香港。广州去过几趟，都是探亲；澳门住过几年，因为家贫。就是在香港，都只是上学、上班和拍拖，间中郊游而已。

1973年 12月，我和新婚的妻子飞多伦多。这是我第一趟坐飞机。听说加拿大很冷，于是上机前就做好准备，穿上了皮袄、毛衣、甚至长筒毛内裤。不知飞机原来是有暖气装备的。穿得过多，只觉越来越热，越来越疲惫。机上人又多，太平洋上空又遇上气流，颠沛得像坐上机器失灵的摩天轮，骤起骤降，脑昏欲呕。恐怕除了机长和服务人员外，没有一个不吐了。捱了半天，终于降落中途站温哥华。一个箭步就往卫生间处冲（当然也带着妻子，但也当然是分头行事），打开水龙头洗洗脸，醒醒神。龙头暖水涌出，我的心里抖了一抖。哦，原来加拿大的公共卫

生间是有暖水供应的。真是个富裕的国家啊。人家的月亮确实圆。

初来乍到，暂住在一个朋友的亲戚的近郊小平房家里。第一个晚上，辗转反侧，可能是时差关系，也可能是环境陌生，睡不着。第二、第三个晚上都如是，耳边总是嗡嗡的，无法入睡。但细听却是万籁俱寂。过了几晚，明白过来了，原来是太静，耳朵里是从香港带来的闹市噪音。在香港不觉，环境转了就觉。人家的月亮不一定特别圆，但与我们的实在不同。

两星期后，找到了房子，就搬了过去。那时，由香港托运过来的行李杂物陆续抵达这个朋友的亲戚家里。游子在外，人地生疏，加上人人都在为生活奔波，找人帮忙，实在难于启齿，唯有每天下班就来搬两箱。15公斤重的箱子，半尺厚的冰，半公里的公车站，就凭一双手。有辆车子多么好。但付得起吗？穷则变，变则通，我把箱子放在塑料废物袋里，弯着身在雪地上拉。塑料袋易破，但破了仍可当雪履用。这样，花一个星期，终于搬完，但腰酸背痛得要命。人家的月亮或者很圆，但不一定有我的份儿。

在多伦多工作了几个月。上下班要坐公车，转地铁，人人排队，秩序井然。有一天，大雪。下班时，人人归心似箭。平时五分钟一班的公车，半个小时还未出现，候车长龙越来越长，聚了好几百人。一小时过了，一辆公车慢慢开进候车月台，还未到站，人潮向前一涌。长龙变乱龙。精壮年青的当然占便宜，但老弱妇女也不甘落后。混乱情景跟在香

港时的完全一样，分别是在香港（60-70年代的香港）天天发生，在加拿大，只在大雪天、下班时才会发生。物质丰富，自然无需争，但看来也只是饮饱食足的那一时刻。人类文明的脆弱，东西方皆如此。月亮的背面都同样是黑暗。

### 麻省第一天

离开香港，目的是到美国念书，加拿大只是过渡。入学申请揭晓，幸得麻省理工录取。那时，我太太怀孕，预产期是九月。74年7月，我先到学校所在，与波士顿一河之隔的剑桥市找房子，做好开学前的准备。

第一次踏进校门印象尤新。城市规划系就在马萨诸塞大道77号，麻省理工大门口的二楼。这门是全校的进出孔道。我一进门，见到大堂两边架起电视机，聚了很多人。走近一看，原来是直播美国参议院就水门事件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聆讯。参议员逐个发言，有批评尼克松的，学生们就拍掌叫好。这是我对美式民主的第一次接触，误导了我对美式民主的看法，要经过若干年的观察和思考后才有真的认识。

我的第一印象是美国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开始。说话也不自由，还有什么话好说？可是，言论自由是用什么尺度衡量的？是不是“任何人可以说任何的话”就是言论自由？我的结论是“对社会与政治权势的影响力”才是合适的衡量——有影响力的人说有影响力的话。没有影响力的人说什么都不会影响权势的分配；什么人说些不关痛

痒的话也不会影响权势的分配。神经病人说的话不算；历史上以神经病为洗脱籍口多的是。

美国的权势分配很稳定。这不是指没有党派和利益之争，但争的不是基本的权势分配。有“影响力”（有机会执政）的党派如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的政纲洋洋洒洒，国会的辩论针锋相对，传媒的评论、专家学者的分析义正词严。表面是言论自由度确实很高，但他们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一致的。大家都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代议制度，再加上一点福利分配。当然，总还有些焦点上或比重上的分别。但只需看看竞选所需的庞大经费，再看看经费的来源，就知真正的主人是资本。政府只是管家，由大同小异的政党轮流当值而已。不同党派的政客们下了班，或下了野，都属同一的俱乐部，去同一的球会。有人分析说，欧美的政事主题只是“政府效率”，绝不涉及基本的意识形态。

就算弹劾总统都是作态的政治游戏。尼克松水门事件是窃取敌党情报，但在政治游戏中升级为妨碍司法，不得不走；克林顿性丑闻是玩弄职权、侮辱妇女，但在政治游戏中降级为公职与私德之辩，不了了之。人人心知肚明，但个个煞有介事。其实主要是政客之间、政党之间的恩怨和野心。像水门事件中最落力的华盛顿邮报从来就是民主党的拥护者，而神秘的“深喉”却原来是联邦调查局不获升职的副局长。他们的动机与国家前途、民族大义之类的基本原则，根本扯不上关系。假如你的言论真的危及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可不饶你。美国也有共产党，

虽绝无影响力，仍受联邦调查局监视，有什么自由？

美国资本主义的稳固和当权者的自信（我这里不是指政府，甚至政党，而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管理阶层）确实惊人。我念的是“城市研究和规划”，也包括经济课，由来自纽约市著名左派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主讲。他治学严谨、教学热情，很得学生爱戴，是给我最大启发的老师之一。当然，他结果没有当上麻省的正教授，这也是意料中事。但从这例子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当权者的聪明，创造渠道去使不满的精英有发泄的出路，但又不构成对权势分配的真正威胁。

如果真的要观察资本主义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可以从一个隐藏但清晰的窗口望进去。最积极和最成功利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改条去争取言论自由是色情媒体。色情杂志、书刊、影视和网络是很大很大的事业。全盛期的 AOL( America Online) 是美国最大的媒体，它的 80%的点击率是色情网页。凡是赚钱，或有赚钱潜力的东西，自然有资本投入，自然有刁钻的律师和政客为它们出主意。这些邪恶事业要拿言论自由作为它们的护身符，因此产生出以下的所谓“法律智慧”和“政治智慧”。“色情是不好，但限制的尺度难定，且容易变成限制政治言论自由的先例；因此，容忍色情是为了维护政治言论自由。”“色情虽是不好，但给它合法的自由比压制它到地下发展来得容易治理，也可以增加税收；因此，容忍色情是为了增强法制。”其实，说穿了是钱作怪。如果色情不赚钱，有谁去为它做言论自由的斗士？

我的最大体会是对“第一印象”的可靠性的质疑。但是，我的结论并不是第一印象不可靠。这说法太笼统，也没有实用。印象是可靠的：美国确实言论自由。但这个印象代表什么内涵？如果言论自由是用来代表言论对权势的挑战，那么美式言论自由就没有意义。它只是在不影响资本主义与精英政治所支配的权势分配下的言论自由，哪有什么民主价值？这思维警惕我对直觉印象要质疑，但又警惕我不要坠入“不可知论”的陷阱。对直觉印象的分析不一定是“对与不对”的选择性分析，而是“这印象代表着什么内涵”的发掘性分析。

## 第一个朋友

我的大儿子在加拿大出生，不满两周大就到美国。我要上学，太太初产，人地生疏，她实在很苦。通过一个提倡母乳运动组织的介绍，认识了一家人。他们给我们很多协助和支持。他们也有一个未够一岁的女孩，很逗人爱。我们两家成了好友，今年还来参加我大儿子的婚礼。他们的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与我的孩子年龄相若，读书很有成绩，也是音乐能手，运动健儿。父亲现是著名女校维尔斯利学院（校友包括宋美龄和克林顿夫人）哲学系的主任，母亲在家相夫教子，一家融洽快乐。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他们。

我们相识时，女的来自得萨斯州，明快爽朗，典型的美国姑娘，男的来自尼日利亚，沉实而具有幽默感，正在哈佛念博士后。他们的孩子

个个卷发，黑肤。特别是老二，叫 Bo，高六尺多，重近 200磅，性情纯真和平，我们都叫他“温顺的巨人”(gentle giant)，念完哈佛现在纽约市工作。

青少年时，他不知多少次因为肤色被人侮辱，特别是在街上被警察截查。最难堪的一趟，是他 14 岁那一年，参加学校的冰上曲棍球队，常常要留校集训，妈妈开车接送。一天，途中，妈妈想给他买冰淇淋，就在路旁停下来去进小商场，Bo 就站在门口等着。来了两个警察（当地警察多是爱尔兰裔），说 Bo 在街上游荡，有何企图。Bo 说等妈，他们不信，要把他带回警局。妈出来了，看见情景，就对警察说，“这是我儿子”。警察看看她，金发、蓝眼，摇摇头，坚持要带 Bo 走，要她拿出她是 Bo 的母亲证据去警局保释。对 Bo 的伤害，对他妈的侮辱，难以想象。这发生在美国最文化、最开明、哈佛与麻省理工的所在的剑桥市。

这些事虽然是在我离开麻省后才发生，但我在麻省念书时已略见端倪。有一个全班参加的大作业是调查一个波士顿黑人区的社会、经济环境。那时刚是美国联邦政府强制学校反隔离，要把黑人区的孩子送到白人区的学校上课，把白人区的孩子送到黑人区学校。全国首先在波士顿执行，满城风雨，要出动国民警卫军。我在黑人区几星期，所见所闻，使我日后决定不在美国发展。

平等是民主的基础。在市场竞争的国度里，难有经济平等，但社会和政治平等总应有吧。如果仔细想想，资本主义的逻辑中，种族问题不

应是问题，因为它对资本垄断没有结构性的威胁。事实上，美国黑人问题有被资本主义“征服”之势。资本主义成功之处，是利用与资本主义孪生的精英政治（脱离群众，高参政成本的政治）去“分化”种族问题。逻辑如下。

经济进步必须去芜存菁，市场竞争是最有效的办法。市场竞争并没有政治或种族意识，但以市场竞争为纲的“精英经济”确实有它的吸引力。竞争的刺激，成功的诱惑，牵引了不少黑人的精力。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近三、四十年来，黑人精英的经济地位实在提高了，但他们的民权斗志却也被消磨了。同时，黑白种族之间的经济距离非但没有缩减，而且不断加深。经济不平等并未有解决。

把市场竞争的“精英经济”套进政治层面上，就产生出“精英政治”。它成功地颠覆了民权运动的政治斗争形式。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转形为既得权益的精英与想得利益的精英之间的“竞争”。民权运动越来越与黑人群众脱节，变成“为黑人请命的精英”（有黑有白）之间的竞争。他们竞争做黑人的代表。代表的名堂越来越多，而且大部份都是政府和大基金会直接或间接支持经费的。民权运动成了个“专业”，靠它吃饭的越来越多。这聪明的办法既包围，又安抚了精英，尤其对未有权而又想权的精英提供他们事业的机会和情绪的发泄。精英们竞争升级和竞争经费，还会斗争吗？资本天下自然太平。

资本主义强调竞争（这其实也是虚像，真正目的是资本垄断），因



此，“经济不平等”非但不可避免，而且是好事。不平等既是经济竞争的动力也是经济竞争的结果。这竞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把一切“政治斗争”（非单种族问题）分化为市场式的“政治竞争”。“政治不平等”也自然地成为了政治竞争的“因”（没有政治不平等，怎需那些为不平等去斗争的精英？），和政治竞争的“果”（既是精英政治，哪还有政治平等？）。

上面我说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是个虚像，但政治不平等却是实事。精英政治是个厉害的手段，其中最厉害的武器是“公众参与”。所谓公众其实是“代表”公众的精英。他们的代表性是个虚像；他们的参与却是实事。精英参与既能满足精英追求权势的欲望，也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展示一番资本制度的民主风范，巧妙地配合了资本主义美国的政治条件（供）和社会需要（求），是个连消带打的上策。这开启了我对政策研究的兴趣。

## 第一个同学

上学第一天，中午找吃饭的地方。学校旁边有一间卖三文治与汤的小店，人很多，我要与另外一个人分坐一张小桌子。他首先自我介绍，原来是同系不同班（他是念建筑与规划综合硕士）。我们一见如故，做了好朋友。

Antonio 是意裔美国人，聪明、爽朗、活力，而且好打不平。其他

谈得来的同学包括来自南达科塔州的 Ric, 刚在印第安人保护区作了两年义工；美籍犹太人 Carol, 家境富裕，但有悲天悯人的爱心。两年的共同学习和生活，搅规划设计经常通宵达旦，除学术上的讨论争辩，更无所不谈。有一趟，在争论得脸红耳热之际，他们突然停止说话，目瞪口呆地望着我。迟了几秒钟我才醒觉，原来我在说中文，大家笑得弯了背。这些都是友谊的基础。我发觉他们代表当时一个典型。

中肯的观察会发现美国学府里多偏“左”。心态上，他们有点自责：对自己来说，反越战既为原则，也是怕死；性解放虽是反传统，但实在也有点纵欲。对国家来说，他们认为美国的富有是剥削了人家，美国的强大是欺负了人家。他们也实在为难，既不能放弃资本主义社会带给他们的成就和享受，但又有改革社会，为贫请命的冲动。他们多属民主党，热衷人权、民权、环保、工运和妇解，相信政府有调节贫富差距和提供社会福利的重责。

偏“右”的可不同。他们对美国的成就非但感到骄傲，更认为是“天命所归”。[很多学者已分析过，基督教新教（有别于天主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崛起成为强国之际。那时，许多资本家、政治家、神学家、甚至一些学者都持以下论调：上帝报答好人，赐予财富，因此，发财是上帝眷顾的证据（这理念原来自犹太教）。美国行的是资本制度，因此，美国发财就是证明上帝赞同资本制度。] 心态上他们有点自傲：我个人的成功是因为我的努力和聪明；

美国的成功是因为美国道德高尚和制度完善。他们多属共和党，热衷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竞争，相信政府的职能越少越佳。

二次大战使美国经济从大不景气中完全复苏，并加速增长（欧洲却元气大伤）。到了 60年代中，经济前景一片光明，但精神空虚。性解放、吸大麻、反越战、参民权，一浪跟一浪，冲击着精力充沛、思想天真的年青人。他们无所适从，迷惑与好奇之余，全部接受。到了 70年代中，能源危机，经济前景变得灰暗。那时，我刚到美国，看到了青年人徘徊于内疚与抗拒。

70年代，福特（1974-77）与卡达（1977-81），共和党与民主党，交替执政。越战虽然结束，但社会分歧与经济衰退不断在困扰美国人，是个迷茫与自省的时期。80年代，里根（1981-89）致力抹掉越战的疮痕，经济走极端的功利，强调“贪是好”（greed is good），社会道德走极端的任性，称“自我的一代”（the Me Generation）。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人信心的膨胀，开始患上大头症。90年代克林顿（1993-2001）巧妙地利用二次大战后出生的一代的双重性格——经济层面上人人发财要紧，社会层面上道德尺度从宽（传统的右派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道德上采保守态度；传统的左派是道德上可以从宽，但对资本家却不太放松）——使他左右逢源。

机缘巧合，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跟着是文化全球化）刚好在那时成熟，给美国国内的左右政争提供一个和解与互惠的出路。经济

全球化实在是资本全球化。从美国资本的角度去分析，资本全球化有赖于，也有助于，美国资本机制和文化的对外输出。右派是资本全球化的剑，毫不讳言想输出“为资本服务的机制”，如自由贸易与精英政治。左派却在对抗资本垄断和为贫请命的虚像下不自觉地做了资本全球化的盾，输出“为资本做缓冲”的美式人权、妇解和工运。在美式民主的旗帜下，左右派不谋而合，各得其所，内部矛盾通过民主外销获得疏解。一个是剑，一个是盾，同是资本全球化的尖兵。为难的是作为美国输出对象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怎能够吸纳和接受这些美式资本主义的双重性格？

我体会了美国资本主义强大的凝聚力和分化力。它凝聚无数竞争力强的“精英”，启动他们的竞争精神，创出高度的经济繁荣。但是这些“精英”也会变成资本主义的“敌人”。竞争中的弱肉强食感动他们对弱小的同情；巧取豪夺刺激他们对胜者的反感；功利自私唤起他们的反省内疚。美式资本主义成功之处是它能够分化它的敌人。不搞对抗，但设置安抚的机制和宣泄的渠道。更厉害的是，把这些机制和渠道纳入与资本主义孪生的精英政治中，使敌人在不自觉中变成它的屏障和助手。在“第一个朋友”一节中，我谈过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精英政治去分化国内的敌对。这里我想指出它如何通过民主外销，一矢双雕地宣泄国内的不满和分化国外的对抗。这些“资本无敌”的现象引发了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兴趣。日后更推动我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探索。

## 第一篇功课

规划理论的老师并不老，约三十出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博士，意气风发。新婚夫人是搞生物的。当时人人都说他日后定要当上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部长，他的夫人会拿诺贝尔奖。他部长倒未当上，但现今是哈佛的国际谈判组织专家，与前美总统卡达是合作伙伴；夫人仍未拿奖，但与他已离了婚。

我第一篇作业的题目是“如果城市管理有如通用汽车公司，那将是个怎样子的城市？”在我交的作业上，他批：“这不是一篇社会科学性的文章，再写”。三次如是。到第四次才拿到分数，是 A。从此，我和他建立了一种非常微妙而珍贵的关系：互相尊重对方的才智，互相保持不同的治学观念。现在，每次到波士顿，总要与他一聚，辩论一番。

我从香港大学拿得学位，但并未真正的念过书，除了自己没有认真外，那时建筑专业的教育方法也是原因。一到美国，接触到系统和逻辑性的社会科学，马上地被震撼，佩服得不得了。老师三次退回作业，使我决心钻研社会科学是什么。不是研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容，而是研究治学的方法。

作为“科学”，社会科学的治学模仿自然科学。以“分析”为主，就是把社会现象抽丝剥茧的细化，逐个分解。这与我从建筑设计出身的思路不同。设计以“综合”为主，通过有原则和依据的选择、取舍，去

创造整体。

多年来才发觉这些并不矛盾，但也不是互补。“分析”与“综合”加起来不一定能理解和处理社会问题。凡社会学科（这里我强调“学科”不等于“科学”。学科的焦点是内容，科学的焦点是方法）都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脱离不开人性。人性是充满矛盾（contradictions）、含糊（ambiguity）和模棱两可（ambivalence）。人类（包括每一个人及人与人之间）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对”（yes，也包括“是”、“想”、“接受”等肯定性的答案），“不对”（no，也包括“不是”、“不想”、“不接受”等否定性的答案），“有可能”（maybe，但“可能性”可以按数学上的“或然率”算定，那就有肯定性的答案了），或“视情况”（depends，但“情况”是可以确定或假设的，确定或假设后便可以有肯定性的答案了）；而是“又对又不对”，“又想又不想”，“又接受又不接受”（yes-and-no）。

我多年前有一段时间研究老人住房问题，特别是老年人对“私密性”的要求。有一个老人家给我的答案很有启发性。我问他：“你认为居处的私密性重要不重要？”他说：“当然重要、但我也极想见见人。”大家自省一下，一定发觉经常遇到同类的矛盾。鱼与熊掌，有谁不想兼得？又爱又恨，有谁未曾尝过？最后的“决定”，往往是事实与环境加诸我们的：难依难舍，但船已离岸；欲战欲和，敌人已杀进来；欲迎欲拒，人家已别有怀抱。这样子的“命运的决定”其实比“人的决定”多得多

呢。

这些人性的矛盾启发我日后的政策研究方法。政策规划并不能单靠“分析”和“综合”，更要处理以上的“超逻辑”，最低限度是“超机械逻辑”的人性矛盾。因此，我把研究焦点放在客观性的矛盾上。也就是说，虽然每个人、每个组织都会有其主观性（内在）的矛盾，但当他们参与决定一个政策，他们个别的主观性矛盾（也就是对这个政策的矛盾的想法：赞成又不赞成，接受又不接受等等 yes-and-no 的想法）会反映在决策过程内，加起来就构成这个决策过程中的客观性矛盾。这客观性矛盾既是个人的事，也是众人的事。复杂的连锁关系往往瘫痪整个决策过程。如果参与决策的个人不想把决定交给命运，他们就得采取主动去处理这些因着每个参与者带进来的主观性矛盾而产生的客观性矛盾。我们虽然不能改变命运，但我们也许可以掌握命运。这也是我日后研究方法论：“主观性的政策规划与评估”的起点。（参看“政策分析”，《城市规划》，2004年 28期 11月）

### 第一次请客

住在学生宿舍的东门大厦（Eastgate），就在学校旁边，与波士顿市区一水之隔，环境很美。楼高二十多层，住上的大部分是已婚研究生。大家的身份、年纪和家庭状况相若，所以往来也不少。一天，轮到我家请客。正值春节时令，太太就“大显身手”，把一年前从香港带来的冬

菇、元贝、蚝土、发菜（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物质丰富，这些“南货”都是珍而贵之，只有逢年过节才从箱底拿些出来飨客），配上由唐人街买来的猪蹄、绍菜，作了一盘荤素混杂的“斋”作为主菜。楼上楼下，来了十多人，全是老外。上菜了，老外们一看，有些睁眼，有些皱眉。尝了一尝，评语是“很有趣”（interesting）。[多年后才知，“有趣”是老外们的客套话，意思是“这东西怪怪的，我实在不想多吃。但是它怪令你难堪，叫它好有违己意。就说“有趣”吧。]只有一个人，开怀畅食，并且频频叫好。这强烈对比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此君叫Ramon，是盲的。

我们的味觉受视觉影响，我们的理性被感情左右。感情与理性很难分开，但做学问功夫，我们必得把它们分开处理。这不是说感情和理性不能共存。事实上，它们必定同时存在。但是我要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感情用事。如果在感情上早已接受或抗拒就很难在理性上辨别真伪了。尤其是规划这一类社会性的学问，我们往往会因自己的意识形态，先入为主地把一些社会现象与及解释、支持或批判这些现象的理论戴帽或打圈，过早截断或误导了理性的追踪。

对伪善反感，是人之常情，但反感的对象应该是“伪”，不是“善”。伪善就是讲正确的道理，做不正确的行为。因此，伪善者的道理往往比真善者更正确。治学之道，是无偏地接受正确的道理，无论它是出自小人之口或君子之口。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朋友的朋友也可以是敌



人。一切都要经理性过滤。

但是，单凭理性，尤其是机械式的逻辑，也是不安全的。研究社会必涉及知识与伦理两个层面。知识关注的是正误，比较理性化。伦理关注的是善恶，比较感情化。我强调“比较”，因为知识有其感情的一刻，曰“直觉”；伦理有其理性的一面，曰“良知”。因此，感情与理性分开处理，并不意味偏重哪一方，而是在不断提醒和警惕自己保持感情与理性间的平衡。我希望这也是我治学的态度。

## 美国两年

美国两年，是我人生一大历程。甜是如愿得偿，踏上充实自己去为中国未来发展做出贡献的第一步；加上所学、所闻、所见常带给我一份新知的喜悦。酸是娇妻幼子，漂泊孤伶的游子之心，可幸太太有魄力、有毅力，持家有度，少了我后顾之忧。苦是功课压力，加上根底不足，只得将勤补拙，日夜苦斗，可幸太太支持，间有红袖添香之乐。辣是老师们批卷毫不苟且，同学间辩论决不饶人；做学问就象问答大赛，问得要狠，答得要切。

回忆中的麻省剑桥是深秋时分，红叶遍地，与妻漫步河边，烘栗子的香味，带寒意的晚风，无言地自问，为什么要离乡背井？不过周岁的孩子爱哭，为使我多点宁静工作，午夜时分，妻抱着他坐在宿舍边小花园的长椅上哄他睡，我下楼看他们，她倒已累得自己睡着了。唐人街脏、

黑人区乱，到处见美国旗，随地是垃圾；穷人的眼中看不到半点希望，职业笑容后头带一点冷漠。麻省理工的美式足球校队，总是吃蛋，但拉拉队向对方球队的喝倒彩，却是“没关系、没问题，一天你是我的伙计”。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确是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可以高枕无忧。

其实，月亮的盈缺有一定的规律：新月是初一，满月是十五。“外国月亮圆”是中国当年弱势的一种自卑与崇外。那时，是中国的初一，外国的十五。我在美国亲见它们的月亮，可以证实，并不比我们的圆或大。但的确是与我们不同，要仔细看才可以辨认出来，而且还可以看出它正在变化。

历史学家公认，现代西方的“国家”观念起源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Treaty of Westphalia)，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成熟于十九世纪，铁血宰相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资本主义崛起后，出现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歧。二次大战轴心国崩溃，象征国家主义没落。接着是共产国际化和资本全球化的竞争。

在资本主义堡垒的美国，资本利益逐渐驾凌国家利益。透过精英政治，资本利益非但成功地支配执政的精英，也成功地分化抗拒它的精英。除着资本全球化，跨国资本、跨国政治逐渐替代“国家”。美国的月亮，就是除着这轨迹运行。是走向初一，还是走向十五？

其实，月盈月缺，可以说是象征机会的来临与消失。关键在能否把握机会。明月光晖转瞬即逝。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也如此。中国

的机会来到了。现时讲的“以人为本”道理很深奥，真的去做，不会发大财。以金钱为本、以贪念为导、以竞争为用是美国发达的过程。但是，国内不安，国外扰攘，更多的钱，更强的兵，有啥用？一个伟大的国家是看它如何照顾弱小；一个伟大的民族是看它如何包纳他人。中国快要走到明月当头的时节了。它选择发财，还是选择伟大？

我生活在资本社会的现实中，就像水和容器的关系。水本身是没有形状的，它的具体形状就是容器的形状。我是水，处身在资本主义的容器中。我要直接体验这个容器的凹凸、方圆、糙滑，去找寻直觉的认识。我要利用这认识去印证理论，探讨资本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探讨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衔接、矛盾和张力。因此，我的治学态度是重体验、重发掘、重比较，以平衡的感情与理性去辨别虚像与真实。这些，都是在麻省剑桥萌芽，在英国剑桥成长的。